

中國
哲

學



第十八
輯

中
國
哲





中國哲學

第十八輯

岳麓書社



责任编辑:周斌

封面设计:胡颖

中国哲学(十八辑)

《中国哲学》编委会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60,000 印数:1-1,000

ISBN7-80520-715-1

B·20 定价:20.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中国哲学》编委会

编 委：孔 繁 卢钟锋 朱汉民
何兆武 沈芝盈 李泽厚
李学勤 步近智 杨天石
林 英 庞 朴 陈谷嘉
陈金生 姜广辉 夏剑钦
唐宇元 张义德 张广保
黄宣民 楼宇烈 潘吉星

主 编：黄宣民 陈谷嘉

执行编委：姜广辉

编 辑：张广保 王启发 章启辉

目 录

1. 中国古代“山文化”通论…………… 吴 锐 (1)
2. 孟子心性论的再反思…………… 刘述先 (35)
3. 谈韩非《解老》中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刘剑康 (54)
4.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刘家和 (63)
5. 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 李学勤 (84)
6. 秦代的儒生与儒学…………… 王启发 (91)
7. 论董仲舒的思想方法…………… 李宗桂 (116)
8.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略论(下)…………… 王钟陵 (145)
9. “玄风”“格义”对道佛交融的影响…………… 李养正 (175)
10. 佛教中国化?
——从吕澂、熊十力论学书简谈起…………… 郑家栋 (192)
11. 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与佛道的关系…………… 龚道运 (215)
12. 北宋理学与象数综论…………… 刘蔚华 (240)
13. 论元代新儒学…………… 徐远和 (275)
14. 走向生命的解放
——略论罗汝芳的哲学思想…………… 成复旺 (290)
15. 方以智、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比较研究…………… 陈一壮 (304)
16. 清代经学思潮…………… 何佑森 (329)
17. 乾嘉汉学论纲…………… 王俊义 (347)
18. 论庄存与的春秋公羊学…………… 陈其泰 (370)
19. 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 朱维铮 (391)
20. 清末的科学哲学…………… 钟少华 (412)

21. 评胡适的个人主义人生观 吕希晨 (431)

书院文化研究

22. 试论岳麓书院的祭祀事业及其文化功效 ... 邓洪波 (456)

资料与通信

23. 如是观天
——新教传教士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天” 田文载 (466)
24. 西方人发现了方以智
——学术通信二则 陈一壮 (477)

中国古代“山文化”通论

吴 锐

作为自然界的山，它与中国古代的居住环境、农业、政治、宗教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找出山在中国历史中一度扮演的角色，并分析它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山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山文化”，这一分析的结果是令人惊异的。这并不是追求时髦，随意与“文化”挂钩。我们将在丰富的史料中找到结论。

一、作为中国远古居民居住的山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山的大国，即使到了今天，经过几千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山河巨变，但山区面积仍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象，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远古时代，山区面积当会比现在更大。特别是北部、西部、南部绵延起伏的大山脉，使中国在地理上形成了一种隔离机制，必然深刻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它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是古代中国居民的居住之所。《尚书·盘庚》有“古我先王适于山”的记载，也就是说商族的先王曾一度住在山里。那么在商代以前，人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典籍中有不少记载：

《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

《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赵岐对“营窟”的注释是“凿岸而营度之，以为窟穴而处之。”焦循《孟子正义》进一步指出：“此营窟当是相连为窟穴。”

《易传·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这些材料都反映了古人山居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材料中的“穴”字并不是指地下的洞穴。《诗经·小雅·大东》云：“有冽洸泉，无浸获薪”，这里的“洸泉”即指旁出的泉水。《尔雅·释水》说：“洸泉穴出，穴出，仄出也。”“仄”通“侧”，如“平仄”往往又写作“平侧”。既然是侧出，则很显然穴在岩旁，不可能在地下。《庄子·徐无鬼》曰：“南伯子綦曰：‘吾尝居山穴之中。’”《后汉书·逸民传》记载矫慎：“隐避山谷，因穴为室”，曹植《七启》：“采奇英于侧陋，宣皇明于岩穴”，崔鸿《蜀录》：“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钱穆先生认为穴在岩旁，不在地下，穴处即岩处，是非常精当的见解^①。《孟子·尽心下》云：“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直接用“丘民”泛指人民，正说明古人是山居的。

关于古人山居，杨向奎先生有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在中国阶级社会形成以前以及阶级社会的萌芽时代，我们的祖先有一个时期是住在阜岸或丘陵上的。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在中国西部，甘肃一带，当石铜器的过渡时代村落地址与现在大体相同，所异者为过渡时期之人民，多喜莫居于阶段悬崖之上，而现代之村落，则下迁于河套平原，这是黄河上游的情形。若黄

河下游，则因河水泛滥，古代的人民也多居于陵阜之上，此种陵阜即名曰州，所以中国古代州字与丘、陵字完全可以通用，如《山海经·海内经》内有九丘：

“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九丘的意义同于九州，或曰九山，如《海外北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

而如幽州则或曰“幽陵”。结合上述《墨子》、《孟子》的引文，全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是居山的了。《尚书·尧典》说尧时水患是“怀山襄陵”，也说明当时的水患危及人们的居住区域了²。

古地名中常见陆、阜、陵、阿等，这都指土山，这一点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已指出。《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王称赞楚国贤人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贾注云：“九丘，九州亡国之戎”，可见丘、州通用。王莽上台，复辟古制，大肆改动当时的各种制度，连地名也不放过，如把带有“陵”字的汉县统统改为带“陆”字的；改湖陵为湖陆，改江陵曰江陆，足证陵、陆二字意义一致。这些地名也反映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古人山居的事实。

此外，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何炳棣先生曾对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作过系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沿着小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³。

居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条件，生产生活都无从谈起。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山有着特殊的

感情，引发了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二、作为中国农业发源地的山

我们今天经常谈到的“文化”，追根溯源，是与农业有关的。“文化”一词源自拉丁语，是动词“Colere”的派生词，其原意是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转义表达出来。智慧文化的内容变为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于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培育人和公民具有参加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等都可称作“文化”^④。大量的考古成果证实，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立国。农业作物是人们生存的主要来源，中国古人既然山居，那么农业也必然与山地紧密相连。何炳棣先生指出，当加强了解中国最古农业系统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我们应注意两个最基本史实：（一），黄土区域农业的开始与黄河泛滥平原无关，（二）我国最古的农业与灌溉无关。换言之，我国最古农业是旱地陆种农业，与旧大陆其他古农业系统有基本上的不同^⑤。何先生的结论建立在丰富的考古材料之上，是可信的。

我们还可以从古代主要的农作物及耕作方式探讨山与中国农业的关系。钱穆先生曾经考证，中国古代农业，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山耕与旱作物，最早最普遍种植的是稷，黍次之，粱又次之，麦稻更次之。西周以前，黍稷是人民的主食，中国远古时农业文化初启，不妨称之为黍稷文化。既然是山耕和种植旱作物，那么灌溉就不甚重要，更何况在远古灌溉也非易事。所

以钱穆先生强调，河流灌溉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的开发，决不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区相提并论^⑥。从农业考古来看，粟是在我国黄河流域首先被驯化的，它在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作物中，占着主要的地位，这里的农业起源就是以它的驯化为主体^⑦。粟也就是稷，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发现。在南方，如广东潮安陈桥等贝丘遗址有大量的骨斧、骨铲、石磨盘和石杵等农业工具。可见，这类贝丘文化的主人，因地制宜，从事渔猎，兼营农业，而且农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沿江河两岸的台地、山岗或丘陵地带，则分布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前面我们引用何炳棣先生的统计，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沿着小河黄土台地或小丘冈，人们的生产之地离聚居地必不会很远，构成了中国山地农业的特色。

再从古代传说来看，中国农业始于神农氏。司马贞在《史记》中的《补三皇本纪》说：“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称曰厉山氏’。郑樵《通志·三皇本纪》说神农氏起于烈山，亦曰烈山氏，也叫连山氏。烈山就是指放火烧荒，以便耕作。神农还有一个儿子叫柱，也是中国农业史上有名的农官之一，《国语·鲁语》云：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法以仪民；舜能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皋陶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

史籍还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周人的始祖弃就以擅于农耕著称。《史记·周本纪》说弃小时候就喜欢种植麻、菽作游戏，菽、麻都长得很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听说后，提拔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弃立了大功，被封于郟，号曰后稷。《吴越春秋》也说：“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尧聘弃，使民山居，随地造区。”《论语》所说的“稷勤有谷而山死”，指的就是他耕于山故死于山，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后稷在中国农业传说中的地位仅次于神农氏，神农氏烈山而耕、后稷山耕的传说正是我国远古农业以山地农业为特色的反映，也说明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作为政治中心的山

在谈到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时，柳诒徵先生指出：“世多谓文明起于河流，吾谓吾国文明，实发生于山岳。”自来传说，古代诸部兴于山岭者多，而起于河流者少，如天皇兴于柱洲昆仑山，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兴于刑马山。出场谷，分九河之类，实在是中国先民先居山岭，后沿河流之证。古代诸部被称作某氏，而不称为某林某蒸，或某君某主，所谓某氏者，即所谓某山之部落、某山之酋长。诸氏并起于山，故后世附会名山之古迹，往往有某某之丘，某某之台⁸。

因为古代人民山居，最高统治者也更要住在山上。关于“氏”字，许慎的解释是：“氏，巴属名山岸胁之以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比崩，声闻数百里，象形。”这完全没有把握到“氏”字的本意，刘师培引用《孝经纬》的话说，所谓氏，就是指的国。《左传》有“肸之上而命之氏”之文，古时之氏，大抵从土

得名，无土则无氏，《禹贡》曰“锡土姓”，土即氏。后世以邑为氏，以官为氏，都是后起之义，与古代以国为氏之义迥然有别^⑧。实际上，以国为氏的渊源仍是山，古代的部落领袖往往直接被称为“岳”。徐灏《说文段注笺》对“岳”字的解释是：“古文岱，上体即屮字，山上加屮，极高峻之意。”《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史记·五帝本纪》沿用《尧典》之文，记载尧向四岳询问治水与禅让之事。裴骃《集解》引用郑玄的话说：“‘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舜“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诸牧就是部落首领，这里把“四岳”与“诸牧”并举，足见四岳就是部落首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周王室的史官预言姜姓之国必将繁荣昌盛，理由是姜姓是太岳的后代，而山岳之高大足以与天相配：“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里的太岳也就是四岳。孙诒让《墨子间诂》认为“四”字与“方”字因篆文相近而互讹，《国语·周语下》有一条材料可以作证，文中说：“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结合前面“姜，太岳之后也”的文句，足证太岳与四岳本一人。他们被称为岳，正是由于居于山，山成了他们的政治中心。

山岳还是王朝的诞生地。《诗经·大雅·崧高》云：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这就是说，以天之高大，只有山岳才能与之相配，而周王室的顶梁柱甫侯、申伯就是山岳降下神灵而生下来的。顾颉刚

先生指出：“曰‘崧高维岳’者，形容岳山之奇伟也；曰‘维岳降神’者，称扬其先人四岳之灵异也”^⑩。

《诗经·周颂·天作》甚至认为是上天造作了高山，太王开始垦辟，周文王继承了他们的业绩，希望子子孙孙永远保持。诗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被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山之重要也若此！古人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山川的存在休戚相关，如果山崩川竭，就是亡国的征兆^⑪。据说孔子临死时也曾预见到周朝的灭亡，他不直接表达此意，而是感叹说：“泰山其颓乎！”^⑫

关于山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章太炎曾提出过著名的“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尔雅·释诂》云：“林、丞，君也”，林为山林，丞即薪蒸，是天子在山林之中的明证。后代政制既衰，而古语流传，其迹尚在，所以直到秦、汉称呼天子所居之地犹为禁中。禁从林声，禁者，林也。又从山字声类考之，则《说文》云：“山，宣也。”以声为训，可见古音山、宣一致，而宣为天子所居，周有宣榭，汉有宣室，这都是沿用古语。天子所居，所以名宣者，正因为其在山林之中而已。《尚书·尧典》记载帝尧考验舜，准备传位于舜，把他“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历代经师均无确诂，章太炎即认为天子既然住在山里，其继承人也必须到山里去。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有卫山之用。尧时君相已居栋宇，而还要纳于大麓者，是因为洪水方滔，去古未远，礼官尚知先例。初拜三公，施行典礼，则必入大麓，是作为赴官践事的明证。《左传》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也就是麓。衡麓在后世，只为虞衡之官，而古代却是宰相要职。综考古之帝都，颛顼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商之兴相土居商丘，其后又有适山之文

（《盘庚》曰：“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周之先，公刘居京，其后又逢旱麓之地。所谓山、丘、阪、京，都是实地而非虚号。人君恒居山上，虽然宫室既备，还要模仿而为之，有时直接经营冈阜，作为中都。《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按：“京”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在金文中写作，正与许慎的解释相合。）《诗经》称公刘：“乃陟南冈，乃覲见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这大概指在夏衰之时，戎狄杂居之世，周之先人公刘居京，其后又逢旱麓之地。其后《春秋》以天子所居为京师，也是仿照古义而命名。上古居橐巢，后王代之以宫室，其质文虽然代有不同，而据山立邑则是一致的。《左传》说：“三坟，九丘”，贾侍中云：“三坟，三皇之书；九丘，九州亡国之戒。”言坟、言丘，都是以山为都之义。及其亡灭，宫室邑里，皆已泯绝，惟丘陵之形独存。更有甚者或夷多汙泽。所以伍子胥预言吴国将亡，则说“吴其为沼”。而屠灭者，也不放过宫室。大概是因为高丘本是王之居处，通于神明；汙泽则是亡虜之所处。又如明堂、清庙、辟雍之制，古今兴废虽然不同，然而丽王公奠天位者，其实、其名，大抵不出山麓。在上古，圜丘正为王宫之地，故附于郊丘者，有王宫祭日之典（《礼记·祭法》）。祭日之坛，而命之曰王宫，可见王宫与日坛同处，在这里举行朝覲、祭享，在这里治事、授学。后世既不能继，还模仿此意，而建明堂、辟雍、三灵于郊外^③。

这真是一篇出色的考据！把山作为政治中心的根源揭示得清清楚楚，我们再看《左传》讲到当时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往往指明它们是传说中某部落之虚，如鲁是少皞之虚，卫是颛顼之虚，陈是太皞之虚，郑是祝融之虚，齐是爽鸠氏之虚。按：《说文解字》云：“虚，大丘也。”可见这些部落都是以山为中心

的。柳诒徵先生已指出传说天皇兴于柱洲昆仑山，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兴于刑马山。史籍中还有不少这类材料，《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娶的是西陵之女，西陵也是山名。颛顼在各种传说中多次出现，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后面还要谈到，他也住在山上。《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参照《山海经·北山经》的记载，空桑指的就是空桑之山。《北山经》说：“空桑之山，无养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虢沓。”“空桑”一作“穷桑”，《路史后记》引用《尚书大传》的话说：“穷桑，颛顼帝所居”。空桑在今河南濮阳附近。在空桑之山上，还有颛顼的“玄宫”。《庄子·大宗师》曾经这样描绘“道”的无所不在：“夫道……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就在这个“玄宫”，颛顼（又称高阳）发布命令，讨伐三苗：“昔者有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①如果联系到颛顼是一位“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②的大宗教主，我们有理由相信，空桑之山上的玄宫就是颛顼施政的中心场所。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话说：“是以尧兴于诸侯，舜兴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舜兴于深山，正可与舜耕于历山的传说相映证。《左传·昭公四年》列举夏代